

咸同兵乱下汪士铎的日常生活

王玉坤¹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 太平天国进军南京后, 汪士铎城陷被掳, 后逃往徽州。避兵途中, 汪氏遍尝子女罹难、亲友亡故、藏书荡尽等苦楚, 突如其来的变故激发了汪氏内心的家国情怀。寄寓桑梓之际, 他密切关注着全国战局的走向, 尽管对大清官兵畏敌的表现颇为不满, 但仍冀望朝廷起用能臣治士匡扶社稷。他认为治乱当用刑名法家之术, 突破程朱理学窠臼, 这一观点后为胡林翼与曾国藩所采纳。当战火席卷皖南大地之时, 对于周遭民变迭兴的乱象, 汪氏将根源归咎为人口激增所致, 提出控制人口的超前举措。汪士铎在战争阴影下的生活经历, 折射出秉持封建王朝正统的士绅阶层在社会撕裂之际所呈现的价值取向和思想分化。

【关键词】: 太平天国 士人 汪士铎

【中图分类号】: K25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030(2018)04-0121-08

太平天国时期, 面临兵祸频仍的江南城乡居民, 如何逃难避乱成为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其中, 不少下层士人, 面对乱世, 不得已而携家挈口潜入山野, 奔走乡梓。咸同之际, 江宁士人汪士铎的逃难经历即颇为典型。汪士铎(1802—1899), 字振庵, 号梅村, 晚号无不悔翁。清道光庚子年(1840)中举, 一生以游幕和授徒为生。近人黄濬谓之: “梅翁是近世南京名士中一大怪物, 辗转洪、杨窟中, 而为曾、胡策划, 一怪也。平日所持政论, 以大乱之生, 由于人口过多, 所言子女多者加税等, 颇近节育, 与欧洲近代之马尔萨斯学说, 及嗜杀用术智诸新说颇暗合, 二怪也。平生痛詈妇女, 主张生女即溺, 而畏其妇特甚, 三怪也。”^[1]而这一系列“奇谈怪论”全部源自他在徽州避乱期间所撰的《乙丙日记》(由《乙卯随笔》与《丙辰备忘录》合编)。在既往的研究中, 不少学者透过《乙丙日记》探讨了汪氏的儒学观、妇女观以及人口思想^[2]。实际上, 该日记还具体而微地记载了汪氏下乡避难、寓居桑梓的故实, 是一部反映太平天国战争的纪难文献, 极具特色。本文拟以汪士铎《乙丙日记》为中心, 对其避乱期间的见闻经历加以考察, 试图揭示江南城居士人在乱世中的日常及其对地方社会的影响。不足之处, 敬请批评指正。

一、由城及乡: 汪士铎的求生之路

咸丰三年(1853)初, 太平军攻陷武昌之后, 挥师东进, 兵锋直达江宁。至二月上旬, 江宁城外战事吃紧, 警报频传, 城厢居民望风而逃。徘徊在人群中的一个士子十分引人注目, 他便是“怪儒”汪士铎。由于他错估了清军在江宁附近的守备力量, 太平军陷城后被俘, 滞留城中长达九月有余, 后逃往安徽绩溪避难。关于汪士铎的乱世经历见闻, 因有相关日记存世, 故其颠沛流离的避乱生活与那段动荡不安的岁月, 还是被真实而详细地记录了下来。

1. 困守江宁厄运连连

日记的开篇, 他特别提及本家与亲友在战乱中的遭遇。因担心家中藏书为战火所焚, 在太平军到来前夕, 汪士铎并未仓皇出逃, 而是选择静观其变。与此同时, 他还积极向当局条陈献策, 谋划保守江宁方略, 未被采纳, 愤懑不已。城陷之后, 他先是被擄置城外,

¹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6JJD770003)

作者简介: 王玉坤,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

后由三婿吴栗生上下打点,得以邀乡人立老民馆于家中,苟且偷安。不过,随着太平天国宣布定都南京,对于城区的管控愈发严紧,深恐为新政权役使的汪士铎,不得不携家眷在城中东躲西藏。因乱军之中自顾不暇,与妻女尽皆失散。

相形之下,城内的富商巨绅们早已逃之夭夭。这其中便包括汪士铎的好友顾子巽,他于正月初三日前来辞行,声称要到附近的云台山避乱。紧接着,有亲戚捎信给汪士铎说,城内以李作权为代表的富户以重金贿赂守门之人,纷纷伺机出逃。与此同时,金陵戒严,江苏巡抚杨文定禁止民人迁徙,然收效甚微^{[2]113}。与此相反的是,汪士铎看到“城内人无留恋财物,微幸贼少,往即去……”^{[2]22}。对此,他不置可否,尽管意识到下乡避难乃大势所趋,终因家室所累,一再错过了出城时机。

不过,留城的际遇令他始料未及。城陷前后,汪氏接连收到城中亲友罹难的消息,譬如,好友上元廩生涂煊与恩师之子陈墀皆先遣其子出城,后“阖室自焚”或“阖家雉经死”,而自己的学生张镇宇竟“阖家二十余口自经死”,他如廩生钱万青、举人刘绍曾、廩生汪星垣、拔贡陆莪等近 30 余家惨遭横祸^{[2]39-43}。一幕幕血腥的画面让他不寒而栗,对于自己当初坚持留城的决定叫苦不迭。正如他看到的那样,无论这些士子是杀身成仁,亦或被逼殉难,对于自己乃至整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后来的事态发展完全超出了汪士铎的预料,全家人几乎丧命。先是二月长女淑苕被东王府所掳,接着六月独生子弃疾夭折,继而九月次女淑莘绝食自尽^{[2]30-31}。在这一连串的打击之下,汪士铎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出城避难已迫在眉睫。可出逃亦非易事。

2. 避地徽州长路漫漫

在汪氏眼中,之所以为外出避兵犯难,主要是受到心理因素和经济条件的影响。首先,他认为外出势必家财散尽,而且乱后返乡之时会难觅栖身之所,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是远徙抑或近移?避城抑或避乡?对于他来说,一切都显得毫无头绪。其次,一个现实问题便是,出城之后也是举目无亲,他之所以身处危局,皆因在外无所依靠。况且自己年届五旬,倘若“远路无多盘川,且必计及移后日食日用,并回日盘川”,再加上“路上人行极难,土匪抢掠甚众”^[2],将来以何为生计着实难料,因此汪士铎对于远徙他乡存在畏难的情绪。

值得一提的是,危难之际,好友胡邦华曾力劝汪士铎避地徽州,因为汪氏祖籍便在歙县,逃往桑梓显得更加务实。但汪士铎却以“书籍繁重,山路不能致,因辞之”^[3]。不过,战争形势的恶化,迫使汪氏不得不打消之前的顾虑,这一点在其与绩溪人冯经甫的一番对话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原来冯氏辞行之时谈道:“绩溪人比他处人不同,世治则出而贸易,世乱则归家,家各有田,多者数十亩,少亦数亩,风俗俭朴,力耕可以自给。寇至则避于深山,退则返,不过数日。地不当孔道,寇不留行也。衣物无值钱者,贼所不取。惟屋太高大,惧为所焚尔。”^{[2]23}正是冯氏这些看似不经意的提示引发了汪氏的共鸣。从后来的行程安排来看,绩溪也就成了他的最终目的地。值得注意的是,汪氏没有选择回到祖籍歙县避乱,很可能与其早年间的游学经历有关,据汪士铎年谱交代,道光二十五年(1845),他应恩师胡培翠之邀主讲绩溪东山书院^[4],在当地士林素有名望,前往绩溪之于他而言更加便捷。

是年十一月十六日,汪士铎通过贿赂一名天平军采薪馆小头目,藉由其帮助于次日脱逃出城,踏上了避乱的路程。汪士铎一路南下,辗转 600 余里,潜入徽州的大山之中。途中则是历尽艰辛,颠连备极,忍饥挨饿乃属家常便饭,如其诗云:“桑梓五十年,未修想见礼。何期流离中,劳君致薪米。烟灶方断炊,百感欲零涕。……”^{[5]583}在历经八个月的奔波之后,他终于在咸丰四年(1854)闰七月中旬抵达绩溪,寄居在五都冯村铺冯经甫处。不知为何,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汪氏都处于流动不居的状态,日记中写道:“(七月)十八日,到冯村铺冯经甫宅……二十日,移寓其族圜二嫂家。十一月十五日,移经甫宅。乙卯(咸丰五年)二月十四日,移三都粟(蜀)马。三月初三日,回。四月二十四日,至宅坦。六月二十三日,移(胡)以仁宅。”^{[2]36}像这样的情况一直维持到咸丰五年(1855)秋天,汪士铎迁居到八都宅坦胡实家中之前。次年四月,汪士铎继妻沈氏也来此会合,开启了一段将近五年的难民生活。

从地图上看,太平军定都南京之后,本区外迁人口的分布十分广泛,遍及今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十余个省市,尤以江北、上海、安徽等地最为密集^[6]。而汪士铎所前往的徽州,因形势险要,“自(咸丰五年)五月以后,以至十二月,徽郡皆无寇警,而远方游宦与夫寓公之地而来者,皆视徽为乐土”^{[7]130}。后来曾国藩带兵驻扎祁门,“祁以大营所在,四方倚为安,避难者源源至”^[8]。尽管在汪氏到达绩溪的半年之前,太平军已经将战火烧到了徽属祁门与黟县。但至少在咸丰十年

(1860)之前,绩溪都未曾直接卷入战争。实际上,也就在汪士铎离开宅坦奔赴胡林翼帐下的一年后,太平军方才染指绩溪,尔后短短五年时间,绩溪上下惨遭战火蹂躏 15 次。在这场屠戮中,宅坦全村直接死于战乱及失踪者多达 439 人,为躲避战乱而举家外迁者难以计数,还有不少人死于战乱^[9]。总体来说,下乡避乱成了汪士铎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转危为安并且迎来了出仕的机遇。

二、忧国忧民:汪士铎的济世情怀

身为一个亲身经历逃难苦楚的底层士人,汪士铎在日记中叙述了自己的逃难过程,同时在避乱期间“论事、论兵、论世乱之源,及弥乱之道,兼及当时将相煊蔽欺枉之术”^[2],对包括徽州在内的江南战事有着直观的感受和深刻的反思与批判。

汪士铎对乡勇镇压叛乱的能力嗤之以鼻,而且认为这些乡勇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在日记中以徽州乡勇为例,历数地方团练之弊。首先,地方团练领导者的动机不端。一些不肖乡绅打着响应朝廷兴办团练的幌子,“一面勒捐,恐喝土人以取钱,托其名为助响……一面执涂人、市人及恒弱瘦怯之书生为乡勇”,结果召募而来的乡勇“日取清钱三百,既而贼来则皆溃”^[2]。诚如当时流传的一首《杂兵谣》所云:“招集四方流亡,滥充勇额,地方骚然贼仍蹂躏如故。”^{[10][146]}而且,保护自己村庄的安全往往是乡绅们组织团练的根本动机,汪士铎便指出,若练勇仅招募本地人士,一旦开战,这些人自顾不暇,根本无法御敌。据乡绅黄崇惺《凤山笔记》记载,活跃在府城和歙县的义练团,乃是由绩溪人吴定洲网罗的一批赌徒改编而成^{[7]128-129}。这批花会勇“不守要隘,而驻祁、黟之市镇,终日四处奸淫掳掠,无所不至”^{[11][110]}。即使在吴定洲的家乡绩溪,遭遇敌扰时,“一见贼到,即放数抬枪而走”^[12]。无独有偶,在祁门西乡金谿人亲眼看到“维时守岭之勇恐贼众难敌也,竟拔营而潜去之”^[13]。再次,乡勇军纪涣散。就在咸丰四年(1854)八月间,驻防祁门榷根岭下练勇以缉捕通敌者为名,将岭西建德县境内 20 余间民舍烧毁,“居民衙之,遂赴皖邀贼渡江,再由张家滩入岭,追破花会勇于岭东三十里外。祁、黟震动。”^{[14][230]}更为糟糕的是,当时有一批由徽州被派往石埭协防的乡兵“恃功骄恣”,也在当地肆行劫掠^[15]。徽州兵勇在外的种种行径,招致石埭等地百姓的强烈不满,兵民关系日趋紧张。次年春,不堪其扰的乡民再次迎来太平军,矛头直指徽州。是役徽州六县失其五,郡城亦失,仅绩溪尚存。事后,汪士铎痛斥乡勇道:“贼目陈姓仅四百人,石埭、青阳、建德、东流之人不堪大兵乡勇淫掠者,实助之导之。故此徽郡之难,乡勇召之,既而先溃,又乡勇成之也。”^{[12][59]}

较之乡勇的畏葸不前,战乱初起时清方将领与地方官的怯懦乃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方面,清军将领因贪生怕死而丑态毕现者屡见不鲜。譬如,两江总督陆建瀛在江宁迎剿太平军时,自称有“霜神”“观音大士”等天神相助^{[12][91]},荒诞无稽无以复加。再如,当咸丰乙卯(1855)春太平军猛扑祁门渔亭要隘时,奉命协防在此的旗人督兵徐荣见大势已去,伺机而退,不料途中被太平军追上,因弃“肩舆”而逃,为乱军斩杀^{[14]231}。次年夏,通政使张芾在皖南督办防务,当他“派兵守祁门之大洪岭,见有贼来,不知其假道以赴东流、建德也,皆失魂而逃……贼从容拔旗去,张芾始有生气,然亦几毙矣”^{[12][116]}。另一方面,临阵脱逃成为地方官的一种常态。当咸丰五年(1855)二月太平军在向徽郡进逼之际,有一伙自江北而来的散兵游勇溃退休宁,向县令索要兵饷 500 两无果,遂涂面纵掠,而休宁县令却弃民奔逃。迨至农民军开拔到徽郡城下,驻防于此的安徽学政沈祖茂早已携知府恩禧等一众大小官员出逃,仅有歙县县令廉骥元一人自缢公堂。即使没有遭受战祸的绩溪,县令田宝琛也是闻风逃窜,次年为防止县令重蹈覆辙,邑绅胡晋梗号召“(团练)局中诸友议集壮丁,名则护卫巡查,而实则暗为防,以免又避”^[16]。在汪士铎看来,正是因为徽州地方统治者的消极抵抗,造成了“官”与“民”的疏离,使得绅民之间的利益分歧和冲突加剧,给地方防御带来了巨大困难。时人曾诘难官府的劝捐行为,谓之:“官和诸绅和官,动云奉宪更奉旨。……说不尽吸髓与敲肤,苛政真真猛虎耳。捐得白银果奚为,堆来如山用如水。……”^{[7][151]}以至于徽州团练越办越难,后来曾国藩在巡视皖南军务时亦扼腕道:“乡团本是良法,然奉行不善,县官徒借以敛费,局绅亦从而分肥,贼至则先行溃逃,贼退则重加苛派,转为地方之弊。”^[17]

有意思的是,汪士铎对太平天国的治军思想颇为欣赏,称其不信鬼神巫术,禁毒禁赌,军纪严明,崇尚刑罚,故此战斗力非同一般。更为重要的是,农民军得到了各地穷苦百姓的拥护,譬如“闻抚州长毛以四百文一日募乡勇,赴之者四万人……宁国油榨沟之战,乡民助长毛围官兵,故官兵赴水死者一二千”^{[12][97]}。并且太平军还善用计谋,“(咸丰)乙卯贼伪为官军以袭江西某州,今年三月初又伪为官军以取祁门,三月又伪为邓少良军以取宣城”^{[12][87]},可谓屡试不爽。

凡此种种,令汪士铎忧心忡忡,由于眼下全国的战局已颇为严峻,仅在咸丰五年(1855)之内,太平军就接连攻占了江宁、镇江、

安庆等 21 个府州，这与坊间传闻中的进剿捷报出入很大。清军节节败退，加剧了汪氏内心的恐慌。次年六月下旬，汪氏收到南京传来的好消息，道是“金陵已于六月初四日击破，冰江该逆首洪杨得获……”，而且还听说钦差大臣和春收复芜湖、武昌、安庆等地。不过，这些传闻真假莫辨，在他看来“贼势党犹盛”，清军很容易“既得复失也”^[2]。事实上，整个夏天汪士铎一度渴望上述传闻能够坐实，可是南京农民政权并无败退的迹象，而耳边的复城传闻甚嚣尘上。对此他感到无比的惆怅，避乱的心情更加凄凉。避难之前，他认为徽州深得地利之便，“东管全浙，西扼江西，南通八闽，北接宁广，乃最重要之地，有险可守，有要可扼，当为一大镇”^{[2]55}。而且当地“历代而来，设兵防御，扼险以守之”^[18]，是一个卒可自保的地理单元。正因为如此，有清以来，徽州境内鲜有兵革之事。可在太平军的猛烈冲击之下，徽州兵防一败涂地。面对危局，咸丰四年（1854）四月，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咸丰帝上疏《请将徽州暂隶浙江折》，主张“徽浙联保”^[11]。对此，汪士铎却不以为然，不禁在咸丰六年（1856）九月的日记中接连设问：恃险自守何以屡屡被犯？穷山僻壤如何纵敌养患？敌无强援怎能轻取冒进？

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汪氏看来，皆由清廷笃信孔孟之道所致。儒家治国尚仁德，孔孟不言兵事，用儒生平叛肯定事与愿违，而当朝科举取士却多“迎合弄文、取巧忽扰、敷衍侧媚之人”，这些人空谈儒家仁义，毫无经世之能，乱世之中不足以独当一面。故此他指出，欲惩小奸须用申商之学，欲弥大乱必谋韩白之术，因此长治久安之道，莫过于崇法抑儒^{[2]95}。除此之外，他还将祸乱起因上升到人口问题。他以身边绩溪农村为例，指出“徽州人固陋，喜人多，婚早”等陈规陋习是造成生育率过高的原因，从而导致了人口增长失控。他认为“人满故贫”“人多致乱”，因此断言：“世乱之由：人多。”^{[2]115}而人口过剩的主要责任在于妇女，因此主张通过晚婚、溺女、用冷药，乃至通过严刑峻法等来节制生育，以此来消弭祸乱。汪氏将社会动乱归咎于人口危机，不免有夸大之嫌，而他对时局强烈的不满背后，隐伏的仍是战乱中逃难士子那种持续的焦虑心态和危机感。此时离南京城陷不过三载，而对清政府的信心荡然无存。在他眼中，“天下滔滔非十年，十余年莫能安”，像他这种遭难文人“肩不能担，手不能提，足不能行，口不能言，奸巧伶俐，生性不能，值此乱世更无生路”^[2]，注定只能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三、在徽言徽：汪士铎的避难日常

在社会动荡，人们的切身利益受到直接威胁，国家又无力行使其保护职责的时候，地方士绅显然是地方自保的关键角色，而且显然他们是把这一利益攸关的问题，而不是别的问题放在了首位^[19]。尽管山居生活较为清苦，太平天国如此大的动乱还是给汪士铎带来了强烈的刺激，逃亡的经历促使他对战争阴影下徽州的民生百态有了深切的体悟，尤其对于周边的社会乱象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汪氏初到绩溪的那段日子里，为了尽快融入当地的生活，他对周围的社会环境作了一番细致的考察。他在日记中描述道：绩溪居民崇尚节俭，而且“无贫富相耀，不见异思迁”，颇值得称许。不过，村民笃信风水，但凡宗族祠堂建筑极尽奢华，而普通民居皆窄小昏暗。日常饮食十分粗劣，加之“绩溪天太寒，山气重”，故此“男多吐血外症，女多癭及疮”，外貌长相“瘦削而长，肥则矮，无大望，上志气，苟且自足”^[2]。孔飞力将之归结为：这里客观上存在着远离经济中心、山稠地瘠等制约因素，加之人口过多，生产技术落后，基本商品匮乏。尽管女婴被溺杀的比例很高，由于盛行早婚，甚至达到了男子“十六皆抱子”的程度，人口增长仍在继续^[20]。这与 600 里开外的南京城显然有天壤之别。城乡环境的巨大差异给下乡避难的城居士民带来生活中的种种不便，致使战争中出现返城现象，顾汝玉的《海虞贼乱志》记载道：“而移乡之富家反多归船，盖因乡间买物不便，房屋低小，居食不如意……家主喝阻不住，故纷纷买舟归，适八月初一日见烧香人杂沓船，相语曰：‘又见快活景象矣，今后死不入乡矣’”^[21]

当然，对于汪氏这样无家可归的士人而言，山间的清幽足以消解那短暂的心理落差，不久之后他便适应了山间的清苦，如其诗聊以自慰道：“祝鸡不知鹭，养鱼不知蟹。贵人侈食单，贫士性岂解。山长笋蕨肥，何用青钱买。饭后自钞书，颇憎竹纸矮。”^{[5]583}这种情况在当时的落难士人中间所在多见，与汪氏有着类似遭遇的安庆缙绅叶坤厚，为躲避太平军的掳掠，也曾举家从省城搬迁至偏远的山村，后来那里成为乡绅们的主要据点，戚友相投者络绎不绝，期间叶氏逐渐贪恋上了山居生活，留下了许多赞美田园生活的诗词^[22]。

在汪氏定居宅坦之后，因有感世事维艰，便藉胡实资助开馆授徒，舌耕自赡。由于他身出“三胡礼学”门下，徽人对其才学极

为推崇,特别是汪士铎先年在绩溪东山书院“仿宋儒胡瑗经义治事课程,分立斋课,因材施教,士林翕然宗之”^[23],因此私塾开课之后,门生纷至沓来,宅坦胡氏子弟受其嘉惠者亦不在少数。例如胡宝铎与胡宣铎兄弟二人,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宝铎考取同治七年(1868)进士,赐翰林,官至兵部主事,军机章京兼总理各国衙门行走。宣铎专治礼学,著有《仪礼正义正误》,他同胡适之父胡铁花交情匪浅,后来也成为胡适的启蒙老师^[24]。

课余时间,士人慕其学识渊博,邀为题词作赋者间或有之。据宣统《上川明经胡氏宗谱》记载:“(程)烈妇,字品霞,为锡环公之女,烈行震动一时,其时名流如上元梅绍箕、江宁汪士铎、瑞安孙衣言……均有诗文纪其事”^[5],文中所云即汪氏撰《大谷程烈妇词》一文。他如《柯烈女》《与诸生言唐时樱桃事适送樱桃诗以示之》《三月二十四日胡实翁馈橄榄示诸生》《辞客招饮》《玄秘塔歌为冯经甫题三十二韵》《钱友人赴试至夕不至忽青衣示书已解缆矣即用原韵以答》《酬余仲岳》^[26]等篇,皆其与士民平日酬应唱和之作。总的来看,乱世中的交游,不仅给汪氏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同时在与地方文士的切磋之中,也间接地推动了“三胡礼学”的传承发展。

在安置好营生之后,汪氏的生活逐渐趋于稳定。不过,此时的徽州已在太平军环伺之下,周遭已是人心惶惶,在广大乡村社会浮现的危情,时时刻刻困扰着汪氏的日常。咸丰五年(1855)三月二十日,有人从徽州府城来,与汪士铎言及,在太平军的一次袭扰后,郡城似乎恢复往日的安宁。不过,接下来发生在私塾附近的一桩命案令其寝食难安,一位寄居在绩溪六都柏坑村的租客曹氏在路过上庄时,被当地村民“无端”杀害了。当绩溪县令田宝琛打算前去追捕嫌犯时,却被村民阻挠,甚至有人扬言要截杀县令。此间,有乡民告诉汪氏,前任县令方殿模到上庄催征科捐时,“上庄毁其轿而殴之(胡姓八虎之为也)”。当田宝琛到任后,“欲往劝租,其人拒而不纳”^[2]。但上庄群情激奋,似乎与两任县令御敌时的表现不无干系。如上述田宝琛未战先逃,其前任方殿模曾在咸丰三年(1853)私谋裹挟捐银潜逃,被绩民围困县衙^[26]。在汪士铎看来,此辈劝饷不成,若要此时处置曹氏命案势必会引发官民之间的更大冲突。

因有感于事态的严重性,当天傍晚,他便向好友胡实了解了命案的内幕。原来,上庄与柏坑两个村子之间素有嫌隙,而曹氏与柏树坑人交好,曾追随他们劫掠过上庄村民,以致其孤身经由上庄时被杀害。此事几乎引发两村械斗,后为某巡检从中调停而止。可对汪士铎而言,危机并未过去,因为上庄为了准备械斗,“新造抬枪、戈矛、旗帜甚众”,居心叵测。果不其然,在与柏树坑人言和的三日后,村内乡勇刺探到有一旌德富户搬家至此,便伙同七都曹姓数十人,包括五、六都的一些乡勇乘夜洗劫了车队,顺道打劫了山上的寺庙^{[2]68}。然而,事后官府并未出兵捕盗,事情便不了了之。

以上汪氏听闻的一系列事件,正好发生于徽州郡城失陷前后,地方官遁逃的消息一经传开,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引发了民间持续的恐慌情绪并不断蔓延。如受府城骚乱波及最为严重的歙县,在城东南约八里处的北岸村,不少村民偷偷加入了太平军,为自保走上了一条对抗官府的道路^[27]。在绩溪岭北,一些乡绅带领百姓纷纷向太平军馈献礼物,而当清军自徽郡溃退至六都之时,镇头莲花滩竟发生了“抗拒王师”之事,而活跃在汪士铎周遭的“上庄民有蓄发借名与贼通市者甚多,众人皆知,彼亦不畏人也”^[2]。可以说,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影响下,在皖南其他府县正在发生的“民间藐视王法,或从逆夸张,或乘乱恫吓,良懦亦畏祸蓄发……”^[28]等社会乱象,已悄然渗入到徽州大地。概而言之,汪士铎在徽州乡村目睹的种种危机,真真切切地反映了战争影响下的民生日常。

四、结语

在太平天国战乱这场几乎涉及江南所有城乡的社会秩序变动中,大概每一个亲历者都会有自己的认识和评价。回顾这段历史,集体记忆的多元书写,仍有助于细节的呈现与不同解释的产生,诚如美国学者梅尔清在其新作《浩劫之后:太平天国战争与19世纪中国》中指出的那样:“虽然太平天国运动的研究颇为丰硕,也出现了像罗尔纲这样的大家,但是多数是局限于政治史的领域,并且受制于近代中国国家建构、革命运动的显示需求和革命话语系统、现代化叙事的影响,因此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既往研究所疏漏的,“恰恰是战争亲历者的切身经历和感受”^[29]。显而易见,如何透过对个体生活、情感、体验以及身体等具体层面的描绘之外,将之与大的历史脉络相关联,揭示其背后重大的历史意义,也即从日常生活史中发现和理解这场战争,或许是我们解读这

场农民战争的一个切入点。

身为咸同之际的城居士人,他们既不同于远离战火而能就近隐居的乡绅,也有别于那些早已计划并且事先已成功避居他处的官绅,因为他们有逃难生活经历和心灵体验,所以在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反映出当时许多社会、文化与心理的面向。本文藉由金陵名士汪氏的逃难纪录,让我们脱离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宏大叙事,呈现出日常生活视野下“逃难社会”的特色。太平军攻陷南京之际,在国破家亡的生死关头,不少底层士人选择就义、举家殉难亦或避兵出逃,也不愿为农民政权效力,这与200年前江南士人以民族气节相砥砺,高举“反清复明”的大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经康乾盛世的教化之后,乱世中江南士人的政治认同与转向。备极颠连的逃亡经历与妻离子散的切肤之痛,更让汪氏深入反思太平天国战乱的根源。他对乡勇或团练镇压叛乱的能力不以为然,将金陵之失与徽郡之陷归咎于贪婪成性的乡勇和玩忽职守的清军将领;而对于太平天国的治军策略却大加赞赏。他眼见徽人饱受战火蹂躏的悲惨的遭遇,但同时又看到他们趁火打劫、畏祸蓄发乃至对抗官府的乱象。由于生活环境突变而产生的扭曲、压抑和仇视心理的作用,他试图为眼前剧烈的社会变动找到宣泄口,于是从痛陈儒学治国之弊,到倡言节制人口之利,以此谋求长治久安之道。

尽管当时大多数人认同“小乱避城,大乱避乡”的说法,但覆巢之下,焉有安卵?进而言之,乡村是否真的安全,确也有待综合考量。况且区域与城乡环境差异导致的生活品质下降、风俗习惯冲突,乃至水土不服等问题,始终是困扰避难者身体和心理的一个突出难题,让他们对避难在乡的抉择始终抱有疑虑与戒心^[30]。故此有学者观察到,迎着战乱出现逆流返城亦或二次避难的乱象,不啻成为城厢居民一种安而忘危的本能反应^[31]。因此关于避城抑或避乡的利弊,在时人看来饱受争议,而汪士铎的避乱日常则无疑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历史注脚。

参考文献:

- [1] 黄濬. 花随人圣庵摭忆[M]. 北京:中华书局, 2013:986-987.
- [2] 汪士铎. 汪梅翁(士铎)乙丙日记[M]//邓之诚. 近代史料丛刊:第126册.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7.
- [3] 汪士铎. 汪梅村先生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12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564.
- [4] 赵宗复. 汪梅翁年谱稿[M]. 鲁燕,校. 合肥:黄山书社, 2006:720.
- [5] 汪士铎. 汪梅翁诗抄[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12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6] 葛庆华. 近代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迁移研究(1853-1911)[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53.
- [7] 黄崇榘. 凤山笔记[M]//中国近代史资料. 北京:中华书局, 1963.
- [8] 周溶修, 汪韵. 同治祁门县志[Z]//中国地方志集成.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6:142.
- [9] 唐力行. 延续与断裂:徽州乡村的超稳定结构与社会变迁[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101.
- [10] 胡在渭. 徽难哀音(选录)[M]//中国近代史资料. 北京:中华书局, 1963.
- [11] 王茂荫. 王侍郎奏议[M]. 张新旭,校. 合肥:黄山书社, 1991.

-
- [12]佚名. 徽难全志[Z]//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294.
- [13]金应礼. 金氏统宗谱:卷4 团防纪略[M]. 光绪三年刻本.
- [14]夏燮. 粤氛纪事[M]. 欧阳岳峰, 校. 北京:中华书局, 2008.
- [15]曹蓝田. 璞山存稿[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47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325.
- [16]汪光泽. 有关太平军在徽州活动的一些史料——摘录自《介夫年谱》[J]. 安徽史学, 1957(1):27-28.
- [17]赵尔巽. 清史稿[M]. 北京:中华书局, 1977:3954.
- [18]丁廷键, 赵吉士. 康熙徽州府志[M]//中国地方志丛书. 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 1975:857.
- [19]赵世瑜. 社会动荡与地方士绅——以明末清初的山西阳城陈氏为例[J]. 清史研究, 1999(2):33-39.
- [20]孔飞力.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M]. 陈兼, 刘旭, 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17:48.
- [21]顾汝玉. 海虞贼乱志[M]//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5册.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353.
- [22]周锡瑞. 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M]. 史金金, 朱琳菲, 译.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12-14.
- [23]刘坤一. 刘坤一奏疏(一)[M]. 陈代湘, 校. 长沙:岳麓书社, 2013:776.
- [24]胡成业. 徽州的胡适[M].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12:42-44.
- [25]胡祥木. 上川明经胡氏宗谱:卷下之下拾遗[M]. 宣统三年木活字本.
- [26]绩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绩溪县志[M]. 合肥:黄山书社, 1998:20.
- [27]绩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北岸村志[M]. 内部发行, 2015:55.
- [28]吴郡木居士. 爬疥漫录[M]//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444.
- [29]张笑川. 日常生活史视野下的太平天国战争研究:评梅尔清《浩劫之后:太平天国战争与19世纪中国》[J]. 清史研究, 2014(3):151-152.
- [30]巫仁恕. 明清之际江南的逃难社会与文化[C]//中国明史学会. 第十五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戚继光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4:252.
- [31]计小敏. 咸同之际江南人避兵江北考[J]. 安徽史学, 2015(3):144-145.

注释:

1 相关论著参见胡思庸《汪士铎思想剖析》，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2期第30-45页；王汎森《汪悔翁和乙丙日记——兼论清季历史的潜流》，载吴密察等编《东亚近代思想与社会》第279-318页，台北：月旦出版社1999年版；张仲民《从〈乙丙日记〉看汪士铎歧视妇女的思想》，载《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2期第144-151页。